

離散時代：以蔣曉雲八〇年代以後小說為例*

何雅雯**

目 录

1. 前言：離散時代
2. 留學生：不由自主的封閉群體
3. 異鄉客：離去、歸返與重建
4. 離散素人：中國、臺灣、美國
5. 結論：國與家

一、前言：離散時代

一九四九年國共內戰結束，中華民國退居中國大陸東南沿海的小島臺灣，除了造成臺灣族群、社會的重大轉折，也形成一批大規模的非自願移民。這些移民來自中國大陸山南水北，分別往臺灣、香港、美國移動，定居，再移動。移至美國者成為華僑、華人 (Ethnic Chinese)；移至臺灣者，相對於前此已定居臺灣數百年、被稱為「本省人」的閩客族群，成為「外省人」，本省人與外省人的省籍情結、資源分配、往來互動，構成此後臺灣政治與社會的複雜議題。

這一類由故鄉向他鄉流動、移居者，或為避凶，或為趨吉，或者身如飄萍、不由自主，都可以放在離散 (Diaspora) 族群的架構下觀察。他們的跨國遷徙，一方面是朝向一個提供生存機會的新天地，一方面又時時回望，重新結自己與故土的特定連繫。然而，在兩端拉扯著離散族群的故國與本土，並不是恆久不變的，離散者終究必須面對日復一日的當下生活，也可能在故國的歷

* 이 연구는 2013년도 서강대학교 교내연구비의 지원을 받아 작성한 것이다.

** 何雅雯(臺灣) 西江大學校 中國文化專攻 助教授。

史變遷中重新檢視、選擇自己的角色和認同。¹⁾這一批華人移民的特殊之處在於，在他們離家數十年後，故國的政治局勢並沒有明朗化，中華民國與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對峙和往來，在冷戰結束後，並未尋得明確的解答。這一層曖昧疑慮，尤以「中華民國」為然。

中華人民共和國在取得國際認可後，成為普遍認知的「中國」。但當年離鄉移居臺灣者，是跟隨中華民國政府在「中國」境內移動；跨國移出成為海外華人者，他們在一九四九年遷徙之際，故土仍然以中華民國為號。二十世紀七〇、八〇年代風起雲湧的社會運動以降，至於二十一世紀，「中華民國」有效控制的領土內，居民不再普遍自認「中國人」，「臺灣人」之稱逐漸取而代之；中華民國政府與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的互動屢屢成為社會與政治紛爭的焦點；臺灣獨立的呼聲漸次升高，幾度連帶引發臺灣海峽兩岸的軍事危機或經濟衝擊……。對於生活於臺灣島嶼上的民眾來說，這是一個漫長的社會演變過程，除了庶民生活的實感，更有眾多知識份子與社會改革者的長久運動累積起臺灣意識，²⁾無論

- 1) 關於離散族群的社會活動，可參見Virinder S.Kalra, Raminder Kaur, John Hutnyk《離散與混雜》（陳以新譯，新北市：韋伯文化，2008.01），李有成亦指出，「離散不僅是散居世界許多地方的華文作家的共同經驗，同時也是這些作家思考的立足點，他們一方面與移居國的文化與現實對話，另一方面則必須面對自身族群或家國的文化與現實。」《離散》（臺北市：允晨文化，2013.08），頁16。
- 2) 關於臺灣意識的形成，相關著作甚夥，本文撰寫之前主要參考了蕭阿勤《回歸現實：臺灣1970年代的戰後世代與文化政治變遷》（臺北市：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2008.06）、《重構臺灣：當代民族主義的文化政治》（臺北市：聯經出版，2012.12）二書，這兩本書從戰前戰後諸多雜誌、論戰文獻中爬梳各方意見與立場的交鋒匯流，對於七〇與八〇臺灣意識形成過程中的思想背景、論述結構乃至影響流變有細緻的討論，與此相關者還有John Makeham and A-Chin Hsiau ed. *Cultural, Ethnic, and Political Nationalism in Contemporary Taiwan*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2005.08)一書。另外，鄭鴻生〈臺灣的文藝復興時代：七十年代初期的思想狀況〉、郭紀舟〈七十年代的《夏潮》雜誌〉、詹曜齊〈七十年代的「現代」來路：幾張素描〉（以上收錄於《思想4：臺灣的七十年代》，臺北市：聯經，2007.01）與李元貞〈播種與茁壯：回顧1980年代臺灣婦運〉、蕭阿勤〈世代，理想，衝撞——1980年代：林世煜先生訪談錄〉、吳介民〈革命在他方？此刻記憶1980年代〉、黃崇憲〈夢想共和國的反挫：1980年代的個人備忘錄〉、陳素香〈八〇九〇兩千以及之前和之後〉、王智章〈綠色小組的社會實踐：為懷念吳耀忠而作〉（以上收錄於《思想22：走過八十年代》，臺北市：聯經，2012.11）等文，亦有介乎學術與歷史訪談、追述之間的紀錄。

認同與否，都可以明確感受到數十年的變遷軌跡，是朝向臺灣本土化的方向重塑住民之間的群體認同。但是，對於中國大陸上的昔日家園、親朋故舊仍懷眷戀的「外省人」，以及不在這片土地上共同經歷變遷流轉的海外華人來說，「中華民國」的變化可能太過劇烈，此一意符 (Signifier) 所承載的意指 (Signified) 漸次縮減，甚至連正當性都可能遭到質疑，自然難以接受或理解，而形成認同的轉折困境。

就以居住在臺灣的外省人來說，為隨軍來臺的軍人及其眷屬所營建的宿舍，通稱為「眷村」(Military Village)，遍布臺灣南北，形成一獨特文化氛圍與人際網絡，意指外省人群體的「外省掛」一詞，也往往指向眷村出身的一群人。於是，梅家玲在討論眷村文學時指出：

……眷村書寫的積極意義，與其說是賡續、再現父長輩的戰爭記憶與鄉愁想像，形塑一特定之族群文化，不如說：正是因為這「原鄉」與「現實」間的流離與遊移，使眷村作家們具備了類似薩伊德 (Edward W. Said) 所說的「流亡者」特質，能經由「雙重視角」(double perspective) 交互透視，對外界與自我產生更深刻的觀照反思，並見證多面相的時代變遷與家國滄桑。³⁾

所謂「『原鄉』與『現實』間的流離與遊移」與「『流亡者』特質」，其實都反映出離散群體的命運和視角，我們也確實可以從眷村文學中掌握戰後五十年間的華人離散問題。然而，在眷村之外，仍有大批經歷離散的「外省人」，他們固然來自中華民國統馭過的中國大陸，政治判斷卻與眷村中人不盡相同，離散途程可能更遠，就算與眷村中人同在臺灣，也仍然有著不同的生活風景。⁴⁾

一九七六年以〈掉傘天〉獲得聯合報第一屆小說獎貳獎 (首獎從缺)、備受矚目的蔣曉雲，是一個很值得探究的例子。蔣曉雲成名於七〇年代末，彼時一批外省籍新銳作家如張大春、朱天文、朱天心崛起，朱西甯宅邸形成一文學沙龍氛圍，朱宅外有鄉土文學論戰，臺灣本土意識正在重整、凝聚，即將開啟八〇年代之後大規模的社會變遷。蔣曉雲作品備受朱西甯讚賞，和朱家姊妹時

3) 〈八、九〇年代眷村小說 (家) 的家國想像與書寫政治〉，收錄於梅家玲《性別，還是家國？：五〇與八、九〇年代臺灣小說論》(臺北市：麥田，2004.09)，頁182。

4) 關於臺灣各地眷村居民與外省人、外省人第二代複雜的省籍與族群意識、臺灣心與中國情並存的雙重認同，以及外省人內部的軍民之別，可參見張茂桂編《國家與認同：一些外省人的觀點》(臺北市：群學，2010.02)一書。

相過從，當時也被視為同一群體。然而，八〇年代，蔣曉雲赴美讀書、就業、步入家庭，匿跡文壇三十年，直到二十一世紀重新提筆寫作，才揭開當年的許多誤認。朱天文即表示，「那麼天心寫〈想我眷村的兄弟們〉結尾，她提了蔣曉雲，其實你並沒有住過眷村。我們『三三』時期，《擊壤歌》裡那種『天然的愛國』，或《淡江記》裡那種中國之思，對你都不存在」⁵⁾；蔣曉雲也自陳：

和王偉忠一樣，在生長的环境中，我透過父母的社交圈認識很多「外省人第一代」，可是我抱著頭想，也想不出哪個叔叔或伯伯是住在眷村裡的，更談不上跟著父母去眷村串門子了。我自己倒是因為結交過眷村的小朋友，進去過眷村；造訪那種有圍牆和衛兵的「軍區大院」，對我這個牆外的「外省人」來說，當年也是很神秘和刺激的。⁶⁾

眷村牆裡牆外之別，使蔣曉雲即使同為外省人，下筆也和當時其他外省作家渾不相類。她曾表示不解，「為什麼那個時候人家會覺得我像張愛玲？」朱天文認為是她和張愛玲相似、自外於潮流的「那份冷靜觀察的氣質」，以及「那份屬於中文的美感」⁷⁾。然而更重要的是，彼時外省籍作者敷陳家國情懷，本省籍作者探究在地政治，都與歷史的糾葛纏結有關，構成一個小說憂國的時代。在這種集體氛圍中，蔣曉雲對生活細節的觀察摹寫特別突出，而少見對國族大義的爭辯、對時移事易的憤懣，致使讀者認定為張愛玲的世俗情調。

因此，「外省籍」作家中，至少就包括了是否曾經歷眷村生活的差異，此一差異可能影響作者的群體認同、題材選擇、敘事風格。若簡單地以外省作者與本省作者相對照，往往描述為對立的兩種族群處境，臺灣島嶼之內彷彿有兩個平行而不相即的世界；然而，若考慮蔣曉雲這一類外省人士，透過他們的視野觀照一九四九之後的人來人往、聚散離合，有助於我們了解一九四九以後的離散華人還有哪些面貌，勾勒一個完整的離散時代。本文以下將討論蔣曉雲八〇年代赴美以後的小說作品，展現同為外省人出身卻異於眷族群體的生活視野。

5) 湯舒雯紀錄整理，〈以幽默的角度寫悲傷的事——朱天文對談蔣曉雲〉，《印刻文學生活誌》6:12=84（新北市：INK印刻文學，2010.08），頁67。

6) 蔣曉雲〈代序：都是因為王偉忠〉，《桃花井》頁4，新北市：INK印刻文學，2011.04。以下本文引述蔣曉雲作品《桃花井》、《掉傘天》（新北市：INK印刻文學，2011.07）、《百年好合》（新北市：INK印刻文學，2011.12）、《紅柳娃》（新北市：INK印刻文學，2013.01）時不另註出處，僅在引文末標示《桃》、《掉》、《百》、《紅》及頁數。

7) 同註5。

二、留學生：不由自主的封閉群體

二〇一一年出版的蔣曉雲短篇小說集《掉傘天》，乃合併她在七〇年代末的小說集《隨緣》⁸⁾、《姻緣路》⁹⁾而來，並補入一九八〇出國以後的〈窈窕淑男〉、〈小花〉、〈青青庭草〉、〈終身大事〉四篇。這四篇增補之作中，除了〈終身大事〉未加註發表時間，其他三篇都在一九八一至一九八七年間，同時，這四篇小說都以在美留學生為題材，應可視為蔣曉雲赴美之後由其生活見聞發想擷取而來。

臺灣自六〇年代起，大量青年學子赴美求學，於梨華、白先勇、張系國、聶華苓等作者輩出，海外留學生文學自成譜系¹⁰⁾。蔣曉雲這四篇小說，放在留學生文學系譜中，並不特別突出，一則因為數量不多，一則因為沒有繁複深遠的家國意涵，也不以性別角色擬託國族議題，正如她在臺灣的早期作品一樣，關注的是瑣碎的生活情狀。然而也正因为她著力於生活情狀，可能反映了更普遍的日常真實：〈窈窕淑男〉中的徐巧璘高三時移民美國；〈小花〉的汪洋赴美讀研究所，他遇到的小花楊麗嬌及其妹妹麗珠、弟弟明鴻都是高中未畢業就赴美的小留學生；〈青青庭草〉透過一群留學生之眼，看一個退休外交官張晴老的生活；〈終身大事〉是留學生毛意勤的戀愛與婚姻——這幾篇小說都聚焦於這些人物的生命軌跡，呈現出故土與異地的對照關係。

與婚姻有關的三篇中，〈窈窕淑男〉的巧璘曾經有過一個南美籍的男友，因家人反對、男友回鄉從事反美游擊活動而分手，因為家人安排相親認識了同為在美華人的林振祖；〈終身大事〉毛意勤在學業完成、順利就職之時，百般寂寞無聊，意外遇到同為在美華人的方蓉，卻遭在臺灣的家人反對；〈青青庭草〉中張晴老教育女兒戀愛婚姻須講究門第出身，但華人與美國人皆講究門第出身的結果是遲至三十歲才初次戀愛，被美國戀人嫌棄不是白人而神智失常。這些去國離鄉卻必須面對婚戀問題的青年男女，雖然身在海外，婚戀問題仍受

8) 臺北市：皇冠，1977。

9) 臺北市：聯合報，1980。

10) 相關作者與作品風格可參見朱芳玲《流動的鄉愁——從留學生文學到移民文學》（台南市：國立臺灣文學館，2013.08）。

故國規範，必須符合親族尊長的期許，獲得家長認可。華人的家長社會並不因為空間的劇烈轉移而放鬆其控制，那是家與國的延伸，甚至也是種族的延伸。

例如巧璘與前男友吉瓦尼的戀愛：

她的大哥電話當時還在臺灣的父母親：妹妹和個南美人同居了！徐太太在電話中哭斷肝腸：造孽！是做父母造了孽的報應！是做父母的沒把女兒照顧好！

……徐家兩夫婦趕了來。巧璘哥哥嫂嫂們說：那種比臺灣還落後的地方！徐先生——那時還不能叫老先生——罵：共產黨！徐太太哭哭啼啼：都是我們上輩子造了孽，女兒才會愛上外國人！（《掉》，頁22）

對那一輩的華人父母來說，與外國人通婚是「造孽」，是「報應」，而青年華人也以國籍評斷「落後」與否，表現出傳統的嫌貧愛富姿態。即使身在美國，即使巧璘後來自己已有工作、有房產，仍然無法自由戀愛，她會考慮林振祖，除了因為自己的多年寂寞，也因為林振祖符合父母期望：

這麼多年了，巧璘連個可以放在心裡想想編個夢的對象也沒有。現在這忽隱忽現的林振祖，因為是個好人，因為是個可以講講話的人，更因為是個家裡會認可的男人，她就不知不覺地想得多一點起來。可是不是愛，巧璘知道。（《掉》，頁22）

「林振祖，」巧璘悄悄對自己說：「這個叫林振祖。是一個中國人，有正當職業的中國人，我們家知道他們家底細的中國人。」一百分，或者給予九十分吧，那倒扣的十分是她的愛情，三十五歲未婚女人的愛情；又或者該把這十分給加回去，為了一個紅瓦白牆綠草地與真正黃皮膚孩子的夢？！（《掉》，頁23）

比較〈青青草地〉中張晴老癡狂失智的女兒，同樣遇到門第問題，更進一步說，是以外顯為膚色的種族血統置換了門第。因此，這是一個封閉的世界，不論在地角色為何，人與人的結合、家與家的聯姻、生命與生命的融合延續，都必須以先天的血統為篩選依據，捍衛他們固有的生理、心理與族群疆域。

相對而言，〈終身大事〉中可以順利完婚的毛意勤與方蓉，除了因為同屬華人，沒有血統阻礙，只是固定範疇內的拉鋸和妥協，更因為毛意勤本人猶豫不決的個性。小說一開頭很諷刺地指出，「這樁事說起來是他自己做的」，但從頭到尾都是各種不同力量的拉扯，毛意勤只是沉浮其中，聽天由命。他為了告知家人婚姻大事返臺，遭家人以外貌、學歷等理由反對之後也就「毅然寫了一封信去絕交」（《掉》，頁72），但絕交之後又讓方蓉來接機、在眾留學生面前

攜手離去，只好將反對的責任都推給了自己的母親。因為他的人生與命運本來就沒有自己的意志：

每個人不都在走一樣的路嗎？考試、升學、就業、成家。他遇見了方蓉，就好像他一上完了中學知道往後跟著要上大學，上了大學知道往後要考托福留學。遇見了一個女人，又在恰當的時候。他並不討厭她，甚至也還喜歡她，重要的是，他要伸出臂膀的時候，她迎了上來。（《掉》，頁88-89）

這個固定的模式，不涉及個人意志或願望，而是一套既定規範，可以說是彼時臺灣青年共同的人生道路。他們的去國離鄉就和毛意勤一樣，是自己說不上來何以必須如此、卻終究必須如此的時代潮流。所以毛意勤害怕未知，雖然以他個人意願，並不是非娶方蓉不可：

可是如果他對她為人妻的期望說了「不」，他知道方蓉掉頭就會走，而他損失不起這個；不光是為了初領風月而不捨，更要緊是怕，怕他錯過了方蓉以後要面對的「未知」。（《掉》，頁89）

出國留學當然有各種茫然未知，未來不可預見，時代風雲詭譎，尤其八〇年代，保釣浪潮已退，留學生背負的不再是救亡圖存、保家衛國的理想，而是此後何去何從的現實困境。出國不是為了學成回國，而就是為了出國：離家是那一代人的最好選擇，然則離家以後呢？下一個可以歸屬的「家」卻是渾沌不明的。希望在一個既定模式裡安穩度日，不冒險犯難，不為了理想衝撞探索——構成了八〇至九〇年代的留學生生命圖象。

在這種只能依循既定模式的離散生活裡，留學生們都是寂寞的。毛意勤因為寂寞而與方蓉相會，巧璘也因為寂寞而試圖接受父母安排，與林振祖往來。在這個有限制、有邊界的小宇宙裡，離散族群並沒有真的緊密相依，那些密切往來都只是一個虛假的影子。小說中以巧璘住處的壁爐點出這一場假鳳虛凰的「戀愛」，當她終於決定更進一步，而將林振祖邀回自己的公寓共進週末晚餐：

她蜷進長沙發的一端，振祖卻走去看那正燃著火的壁爐。巧璘說：「假的。」那壁爐不過是燈光、色紙與電熱風罷了。（《掉》，頁25）

這個壁爐意象點出巧璘與林振祖共同的人生問題：都在維持一種虛假的形象。巧璘將林振祖視為婚姻對象，不是發自真心的愛或抉擇，而是要讓父母滿意；林振祖與巧璘的來往，也不是表面上看起來的男女約會，身為同性戀者，他也掙扎在隱瞞與誠實之間。化自《詩·周南·關雎》「窈窕淑女，君子好逑」的小說

標題「窈窕淑男」已經點出這一層表裡曖昧：將原句「淑女」代換為「淑男」，似乎是婚戀關係中男女角色的顛倒交錯，這是巧璘「窈窕淑男，女子好逑」的故事；然而，在林振祖的現實中，「窈窕淑男，君子好逑」才是他的恰當選擇。林振祖解釋自己的曖昧態度，是因為：

「我想了好久，我想也許我能改變，也許我能永遠不要告訴妳，我會真的愛上妳，我們可以真的結婚。一個中國人在這個圈子裡找一個固定的愛侶並不容易。我怕死，我怕老，一個人寂寞地老去——」（《掉》，頁25）

對「固定」的企求源自離散者對死亡、衰老、寂寞的恐懼，巧璘亦然：在美國，在舊金山這樣一個大城裡，有個人能一起吃個中飯談談天，哪怕僅只於吃飯與談天，也好不容易了；她想，要懂得珍惜啊。（《掉》，頁21）

事實上巧璘工作雖非出類拔萃，畢竟也率領一組美國職員，林振祖更是執業會計師，都已經是生活穩定的中產階級，而非前途茫茫的青年學子了。然而這個離散族群，內在的焦慮不是無法融入在地生活圈，而是無法固著、固定在舊有的秩序裡。因為害怕無法與來處相同之人建立連結，他們必須通過血統的檢驗，建立起與故國、故鄉的鍊結，離散之所以為離散（Diaspora），而非單純的移動（Transfer）或遷徙（Migration），也正是因為這一層心理鍊結的強度。離散不只是由此地移動至彼地，而是將出發地視為根源，在移居地開枝散葉，有一層隱形的主從關係。表面上他們都可以在移居地找到一個安穩的社會位置，也可能與移居地不同國籍、種族的住民融洽相處，但仍然必須保持自己與他人不同的覺知，實踐出發地的語言、文化、人際網路、社會規範，那才是他們真正的生命儀軌與認同。

我們可以對照四篇小說中最為慘切的〈小花〉，關於那個時代常見的小留學生議題。自稱小花的楊麗嬌在臺灣是一流女中的高材生，若繼續留在臺灣，有可能進入最高學府臺灣大學。然而為了升學不順利、趕在兵役年齡之前出國的弟弟，被迫姊代母職，也成了美國西岸的小留學生。小說藉由在臺灣已讀畢大學、赴美深造的汪洋，開展同一時空下不同世代的留學生處境。對小花而言，在故鄉的父母不諳英語、山長水遠，無法依靠，同在加州的叔叔嬸嬸又懷有私心、不能信任，語言相通、同樣來自臺灣的汪洋成為她少數在現實與情感層面都能夠依附的對象。透過汪洋之眼，我們看到小花父母以現金購得、供姊

弟三人居住的亨廷頓灘（Huntington）居所：

房子不小，四房兩廳，卻空空落落。客廳中唯一的一樣家具是一條長沙發，上面蓋著條花床單不知道是擋灰塵還是遮破敗。電視、冰箱、床、飯桌倒都齊全，可是說是個家倒更像個寄宿舍。房子老舊，現任屋主又沒有重新裝修，汪洋不知是不是因為那褐不褐黑不黑地毯引起的心理作用，一進屋就覺得一股子悶悶的味兒不大對勁；想想自己頭次來好像該帶點東西或至少講兩句好話，卻嘴笨得說不出什麼。（《掉》，頁50）

「空空落落」、「破敗」、「說是個家倒更像個寄宿舍」數語，已經點出小花的生活現實與心理處境。即使產權在手，因為現實的紛雜煩難，她無法將此地經營為「家」，與學校距離遙遠、必須日日在高速公路上飛車搏命上學，也標示出她與在地生活的阻隔。小花的弟弟妹妹尤其更加格格不入：弟弟聚集數名背景相似的華人少年，「四個黃小孩校裡校外同進退，倒也不怕外侮」；妹妹麗珠「變得更安靜沉默，在學校裡不跟人說話不參加活動，老師簡直不知道她懂話不懂……學期結束時再度來信約談家長，請家長考慮讓麗珠接受特殊輔導和心理治療」（《掉》，頁45）。這一批小留學生的命運就如同小說結尾對校園的描述：

外面南加州著名的陽光照滿一校園，行政大樓旁不遠的花圃有花匠在翻種時新花卉；可能只為了學校哪裡有筆預算要在七月中以前花完這樣一個蠢理由，原來長得很好的，黃的粉的紫的各色小花給從土裡挖出來棄擲了一地。……

那些離了土的小花兒小草兒，在聖佛南度谷地吹來的焚風中漸漸委頓了。

（《掉》，頁60）

從故土被拔除造成了小花的委頓，但同樣是遠離鄉土，汪洋卻可以平安度過，甚至有了研究所學妹相伴左右。以小留學生議題而言，當然是因為小花生理與心理皆未臻成熟，不堪重荷，但從小說所鋪陳的細節來看，可以發現這不僅是小留學生的現實困頓，不僅是遠離故土而已。小花雖然辛苦，但課業並未落後，比其他華人學生都要出色，也得到美國教師認可，各方面都逐漸適應，如果只有小花一人隻身在美，或許會是個讓家鄉父老引以為豪的傑出兒女。然而她必須帶著語言不通、無法融入在地生活的弟弟妹妹，等於是背負著故鄉的無形責任。在這種情況下，感情又遭到同為華人的汪洋拒絕，前所未有地大叫大哭，「她恨！她恨！恨爸爸恨媽媽恨麗珠恨明鴻恨叔叔恨嬸嬸恨自己恨汪洋，恨這個世界！」（《掉》，頁53）之後，傳來的就是明鴻無照酒駕，車禍身亡。在

前來美國領取骨灰的母親面前，小花「一面怨詈自己，一面不自知地也等著母親伸過來慰藉的手」，但母親傷痛絕望，「忘了面前哀哀泣訴的大女兒，她不知道女兒在等著一個永遠堅強的母親伸手過去」（《掉》，頁55），母女之間的隔閡不相知，小花懷疑自己對母親的意義，使她失去了與他人的聯繫，這是心理層面的故土，比空間隔絕更為強烈的失落。接下來才是真正的委頓：

她忽然什麼都清楚了：沒有人，沒有人，除了自己，沒有人可以依靠了。從上飛機到美國的那一天起她就沒有人可以依靠了。他們都靠她，弟弟妹妹甚至於爸爸媽媽，還有自己，都靠她一個人了；只是她本來不知道，以為換了一個地方也還是上學放學拚成績，現在知道了，弟弟卻已經死了。（《掉》，頁55-56）

小花開始打電話到這裡那裡。她的肩頭很重，她不堪負荷地簡直想化成一灘泥趴到地上去。可是母親像個無助孩子一樣的坐在一旁哭泣，妹妹可能瘋了，弟弟已經燒成灰了。她電話打來打去，一時中文一時英文，把事情一樣一樣的辦著……。

最後一件是到大學去辦她自己的休學手續。（《掉》，頁57）

這種真正的孤絕感，在於她既沒有了與故土的聯繫，也切斷曾經建立起的在地生活秩序。與故土的聯結讓她難以負荷，但聯結斷裂也摧毀她的人生意義，更進一步，她和汪洋道別，不只是因為情意難諧與學業中斷，小花還「在心裡說，別了別了，她的祕密再也無人與共，她在此時此地和人永訣了」（《掉》，頁59）。

父母、弟妹是小花從故鄉帶來的責任，同樣來自臺灣的汪洋是她在異地可能也願意建立起的情感關係。在另外幾個婚戀故事中的人物力求鞏固或必須鞏固與故土的心理鍊結時，小花卻與此斷裂訣別。離散者並非無根之花、流水之萍，他們與家園／根源仍有一道無形的線索相連，所以不至於如同小花一般委頓異鄉，但有可能顯眼、觸目，成為在地社群裡格格不入的特異人士，例如〈青青庭草〉中的退休外交官張晴老。

張晴老不是留學生，在美國華府工作多年，退休後與調任南部實驗室的兒子一起遷居喬治亞州（Georgia），接待帶著年輕朋友群來訪的外甥余國豐。余國豐的朋友群雖然也都是臺灣留學生，有共同根源，但張晴老居美日久，與故土的鍊結卻比赴美未久的學生們更深厚。他的客廳裡，茶几與椅子都刻了八仙過海之類的傳統中國故事，家裡陳設石壽真蹟等古玩字畫，牆上掛著的父親畫像穿著清代官服，讓他可以向年輕學子們說明清代補服與品級的問題，更且熟

知陽曆、農曆、陰曆等小輩已不明瞭、臺灣報紙也常錯用的固有詞彙與概念。對張晴老而言，雖然在美國多年，兒子是美國化工博士，女兒只會說英文，但他與故土語言、文化、社會的聯繫仍然牢不可破。更進一步說，他的故土並非八〇年代在臺灣的中華民國，而是一九四九以前的中華民國：

……從張晴老自己當年風光談起，不知怎麼轉向了民國人物褒貶。然而老人家提起的那些時人名對小輩們卻真正是在講古，一點不能引發興趣，一個男生湊趣，並舉了幾個名字如孫運璿、林洋港上去，張晴老究竟是「不看」臺灣報紙的，也是對答不上。主客談天，各說各話。（《掉》，頁69）

八〇年代名動臺灣政壇、也對此後政經局勢頗有影響力的孫運璿、林洋港，對張晴老而言並無意義，因為在臺灣的中華民國政府已經不是他的故土或根源，他所熟知的「時人」是在那之前、青年學子無從與聞的人士。令人玩味的是，張晴老對陰曆、陽曆、農曆等時序規範的熟知，卻並沒有讓他跟上時代。時間在此開展出兩重意義，第一重是既有的、穩固的無形規範，第二重是促成變化的動態力量。生命與文化是這兩種時間的交互作用，張晴老執守故舊、無法跟上時代，很清楚地表現出離散族群的生命裂隙。

像張晴老這樣的離散者，在歷史巨變發生之前已經身在異地，後來的變化與他無涉，身在美國的張晴老與彼時的臺灣住民，對張晴老來說可能是相同的：都是自一九四九以前的時空，挪移到他處的離散族群。只是，透過一群二十出頭的小輩，我們可以看到張晴老所認同的故土，其實已經滄海桑田、不復當日了。小說最後讓張晴老「穿了唐衫布鞋在草坪上練太極拳」（《掉》，頁70），唐衫、布鞋、太極拳的傳統文化意義豁然可知：

張晴老在自家前院目送，不開車的幾個人回頭向主人揮手致意，看見白髮的古稀老人一身鵝灰衫褲在晨曦中佇立。圍繞著那維多利亞鄉村別墅型洋房的是好大好大一片剪不完的青青草地。（《掉》，頁71）

開車向前駛去的，是即將走進新時代、新世界、新價值的世代，張晴老則是在西式外觀的建築物中，包裹、固守著各種舊時代的物質與精神生活。他讀的是美國當地出版的刊物，但這刊物卻以中文討論在美華人。他的在地生活裡充滿故土元素，他的兒子努力適應在地價值，他的女兒因為兩種價值的衝突而神智失常，他雖宣稱不看臺灣報紙卻了解臺灣報紙語彙、試圖投稿辯難糾正……小說結尾這一幕道別，正說明了張晴老這一離散者類型，他固守根源、開枝散

葉，但卻無法蔚然成林，而是滿園日日除日日生、日日生又必須日日除的回憶。

三、異鄉客：離去、歸返與重建

二十世紀五〇年代以降，臺灣海峽兩岸人民基本上互不往來，只維持局部戰爭與諜報活動，直到一九八七年臺灣開放大陸探親，使一九四九年前後隨中華民國政府抵臺的「外省人」有機會重溫親故，一圓返鄉夢。這一波移動與歸返結局有喜有悲，少部分人物可以重敘天倫，但物是人非、歲月凋零之嘆與彼時兩岸巨大的經濟差異、價值衝突成為更鮮明的話題。二〇一一年出版的《桃花井》，是以楊敬遠、李謹洲兩人的離鄉與返鄉為主軸，但除了楊敬遠的故事寫作時間較早，約當八九〇年代之交，李謹洲的故事則都已經完成於二十一世紀，返鄉浪潮已過，中國與臺灣的政治、社會、經濟情勢又已經大不相同了。蔣曉雲說明這個系列的寫作緣起，肇端於眷村因為戲劇表演而成為熱門的文化研究題材，一時之間眷村彷彿成了臺灣外省人的同義詞，然而她所生長、往來的外省人族群卻與生活於眷村者大異，並非忠黨愛國，反而時有不滿，只是未得宣洩：

民國三十八年到臺灣來的外省人可能很多都是跟著國民黨軍隊撤退的軍人，可是也有「純難民」，他們是不見容於共產黨，卻和當時國民黨政府沒有太多淵源或理念交集的中華民國「國民」，用眷村的說法是一群「老百姓」。他們中直接遷移到世界各地，變身「華僑」的是姓孔、宋的少數，很多過了羅湖橋到香港受英國人的庇護，有一些就去了臺灣；除了不是跟著部隊開拔，他們到臺灣的理由林林總總，也許是給垮台的政府再一次機會，也許是逐水草而居，更有碰巧了時辰被斷了歸鄉路的（我都知道這麼一位到臺灣來渡假的長輩）。偏偏我的家庭社交所接觸和知道的就是那個「非主流」群體。現在回想起來，那些叔叔、伯伯、媽媽、阿姨，真是什麼樣的人都有；有博學的大儒也有之無不識的文盲，有顯貴也有庶民，有我父母的湖南同鄉，可是也有很多南腔北調其他省分因為國共內戰而流浪到臺灣的外省人。

……可是群體雖然小，卻因為比大家都是行伍出身的眷村父母缺少統一背

景，我聽到的事就很多樣性，尤其跟眷村的忠君愛黨氣氛不同的是這些人對當時國民黨的不信任常常溢於言表。（《桃》，頁4）

這批外省人面貌各異，但卻可能是臺灣社會變遷中最沒有聲音的一群：在兩蔣主政、外省人居上的社會裡，他們不與眷村中人同調，又不認同兩蔣，隱匿在市井之間；在臺灣意識興起、轉型正義成為社會主流思潮的二十世紀末，他們又被簡單地歸類為壓迫本土意識的外省族群；進入二十一世紀的族群和解階段，眷村文化以溫暖、互助、講恩義的形象重現於大小銀幕，然而眷村外的外省人故事仍然塵封未明。蔣曉雲的書寫活動，顯然有為父長輩傳遞往事、敘史紀歷的企圖。

其中最鮮明的是楊敬遠的形象。〈去鄉〉與〈回家〉兩篇，分別是楊敬遠人生中最重要兩次移動：離家與歸返。他的離家是審酌時勢、情非得已，但一去四十年也是出發時難以想見。〈去鄉〉中點出楊敬遠原來應屬地方富紳，受過新式教育、與妻子秉德自由戀愛結婚，家裡曾僱有總管、奶媽等。這一類人在共產黨進城時最為驚慌恐懼，他們不見得對敗走臺灣的國民黨有甚麼認同或感情，然而共產黨幾度公審、開會、槍斃，鎮日監控、勒索，逼得他不得不離家遠去。妻子帶著未滿周歲的幼兒無法相隨，只能默默地為丈夫藏妥首飾：

「總要想辦法帶點路費，」秉德低低地說，彷彿說給自己聽，「你自己都不曉得這一路要走得有多遠。」（《桃》，頁24）

小說前半，夫妻兩人言談中只有局勢險惡、遁走管道、與家人道別，而不及於返家期限，直到此時才直接指出彼此心中的茫然：此去路程遙迢，但究竟是如如何遙迢？對動盪時代中的渺小個人而言，是不能回答的問題。秉德雖然承諾，等孩子斷奶，「我們就會去找你」（《桃》，頁25），但彼時楊敬遠身在何處、如何聯繫、如何尋找，都在未知之天。等到楊敬遠與堂哥道別，才觸及現實：

「賡虞，」哥哥喊他書房裡的名字，聲音也嘶啞了，「生離死別，生離死別哦。」

他別過臉，搶先了幾步就往前衝，走開了好遠才回頭，看見大他十來歲的敬文佝著腰，捧著水煙袋，還是慢慢的跟著。他深深一揖，謝他的深情，作勢請他回去，那邊站定了，他耳裡彷彿聽見自己哥哥的聲音：生離死別，生離死別……。他不知道敬文怎麼忍心道破這一句！（《桃》，頁27）

其實不論是敬文、敬遠或者秉德，彼此都心知肚明，這一去可能是生離死別。但生離死別並非事先安排，脫逃之途也是傍晚得知，當晚隨即啟程。這一類聚

散匆促、生死潦草的故事，在一九四九年前後的中國大陸各地上演不絕。

然而若只是〈去鄉〉一篇，雖然悲哀慘惻，畢竟只是時代的共相，無異於意外隨軍抵臺的眷村族群。楊敬遠的故事在〈回家〉的開展之後才能看到眷村牆外的外省人，與眷村牆內同鍋共灶、雞犬相聞的族群有甚麼不同。透過李謹洲之眼，讀者看到楊敬遠在臺灣的處境：

共產黨進城後，楊家既地且富，楊敬遠被逼得隻身潛逃，後來的同鄉帶來壞消息，說他留在家裡的妻子受逼不過，帶著稚齡兒子投了湖。楊敬遠家裡前清有功名，父子兩代都不做民國的官。……一個也帶著個孩子的年輕寡婦自媒，楊敬遠先不肯，後來喜歡那孩子，又同情人丈夫死在共產黨手裡，又怕人母子生活沒有著落，才應了二婚。這一家子可不是人家說的什麼苦大仇深？怎麼又給國民黨這邊抓了呢？（《桃》，頁17）

李謹洲的疑問，指出臺灣外省族群的複雜多元。與共產黨勢不兩立、苦大仇深，並不等於認同中華民國政府，也不見得能為中華民國政府所容。李謹洲自己原來是忠誠的國民黨員，也不明所以遭人檢舉，隔離審訊之後，「察該員雖無檢舉情事，然逗留匪區過久，思想難免毒化，然情節終非重大，茲判感訓六個月」（《桃》，頁35），事實上卻在火燒島關押五年。這一類外省族群，在兩蔣去世、「反攻大陸」夢碎時，可能並不如眷村外省人一般天崩地坼、撕心裂肺，他們的親身經歷遠遠大過政治信仰，於是離鄉四十年，刻骨的不是漢賊不兩立的國仇家恨，而是彼亦非、此亦非，人生終無歸處的虛惘。

從這個角度思考，才能理解這一批人的返鄉，不止於與睽隔至親重逢，回到熟悉的空間、鄉土，還有生命根源的重新尋求。以楊敬遠而言，雖然冤獄二十餘年，但入獄前因再婚認養的繼子宜中成了他的寄託，雖然宜中母親再度改嫁、宜中也已重新改姓歸宗，但楊敬遠與宜中的信件往來，讓宜中真心誠意地感激楊敬遠給予的父愛，將楊敬遠迎接回家奉養十一年。楊敬遠「三十一歲離開家鄉，三十六歲被關到火燒島」（《桃》，頁43），繼子與之通信二十年、恩養十一年，也已經與他的家鄉歲月相等，然而楊敬遠始終有「自己在這裡是多出來的了」（《桃》，頁44）之感，因為在移居之地，累積的是「自己坎坷冤屈的一生」（《桃》，頁45），獲知故鄉親人仍在：

「哦哦哦——」原先只是哽咽的敬遠聞言卻大哭出聲。老天沒有眼呀！他的一生是老天一個殘忍的玩笑，「哦哦——我這個樣子，我，我這個樣子——

一」苦命人還偏又受盡磨難死不掉，四十年未見的妻兒將會對他的潦倒怎樣的失望！（《桃》，頁46）

對於眷村族群來說，移居臺灣雖非心中所願，但他們透過親密的生活、同質性高的軍眷身分，建立起穩定的價值觀、共同的願望，足以抵禦世事變遷流轉帶來的荒謬感。然而楊敬遠這一類無從依託、無所認取的外省族群，只有一事無成、畢生荒唐的悲哀。當宜中問他，去大陸探親過後，「回程呢？」「你什麼時候回來？」，他「心裡想只怕回不來了」（《桃》，頁53）。「去」與「回」、「離」與「返」的辯證，是這一代人共同的兩難：對宜中而言，臺灣是要「回來」的家，這一點楊敬遠並不否認，但他「只怕回不來了」的心境，與當年被哥哥敬文說破的「生離死別」也相去不遠。所以，無論楊敬遠如何移動，心中的認知都是，此刻道別的此地此人，此後都不會重臨重逢，離別就是訣別。那麼，人生的根源究竟在哪裡呢？

可惜的是，楊敬遠的確沒有如願回到昔日作別的楊家花園，途中因病而亡。事實上，楊敬遠的故事有所本，是蔣曉雲父親的「熟人才從綠島放出來的事，那時候他們同鄉之間發起資助這個人返鄉探親，沒想到這個關了幾十年甫出獄的人才走到半路就因病去世，至死沒能返鄉」¹¹⁾，但蔣曉雲重新詮釋「回家」的意義¹²⁾，讓楊敬遠雖然不能返抵家門，但畢竟死於鄉下祖籍地，結髮妻與親生兒就在左右，「他到死沒有鬆開緊緊握住的手，是四十年錯過的親情他要帶了走」，原來擔憂自己半生潦倒無言以對妻兒，「不意他相當臺北闊佬頓飯之資的幾萬臺幣積蓄竟讓兒子全家覺得前半生吃的苦都受了補償」：

他原先又最愁煩妻子秉德要看見他的龍鍾老態，不意磨難已使她全盲。劫

11) 同註5，頁73。

12) 蔣曉雲亦在〈[跋]洞中方一日〉中說明，「『楊敬遠』自然是捏造的，原型坐了多年冤獄的苦人卻是確有其人，……只大約知道這個某伯伯是我父親舊識，他隻身在臺，放出來後本當無依無靠，幸而關進綠島前收養的義子有良心，接回家開計程車孝養。等到兩岸開放探親，同鄉募捐資助他返鄉，卻死在半路。我記得父親唏噓道：『最後連岳州城都沒進去，還是沒有回到家！』」並補充自己的寫作緣由：「這個故事深深感動了我，就在父親離開我家後動筆寫了〈楊敬遠回家〉，用我的方式送這位不知姓名的伯伯一程；和父親這輩『古人』的『重去其家』不同，生為難民後代，我覺得有家人的地方就是『家』；〈楊敬遠回家〉的主人翁雖然也一生沒能重回到他當年倉皇逃離的老宅，可是終究在我編的故事裡回到了『家』。」（《桃》，頁243-244）

後重逢的某一天，秉德粗糙的手撫遍他的臉，輕輕地說：「你有鬍子。」他們洞房次日早上，新婦黑白分明的美目瞟一眼涎過臉來的新郎倌，她也是說的這麼一句話。

彌留之際，迴光返照，敬遠忽然覺得精神一振，睜開眼睛，卻看見床邊瞎眼老婦漸漸化成昔日美麗的少婦，中年農民也變成一個平頭圓臉的可愛男孩，他們身後出現一花架，纍纍垂下紫藤花，有的盛開有的含苞，深紫淺紫粉紫還有綠葉點綴其中；顏色分明，不是他那張看模糊了的小照。不是——他笑了，是真的！他握住愛妻嬌兒一人一隻手，照相師傅高高舉起打光燈，敬遠把兩手一緊，對他們說：「看！」

灼然白光一閃，楊敬遠回家了。（《桃》，頁56-57）

蔣曉雲的安排極盡體貼同情，給予楊敬遠顛沛荒唐的人生一個差可告慰的結局，因為漂泊在外造成的錯失、折磨、愧疚，都獲得了補償。在臺灣半生積蓄只有不值一提的幾萬臺幣，但這對甫開放的中國社會來說已經是一筆鉅款，離散者的歸返畢竟為故土提供了經濟支援。夫妻兩人皆老病交迫，因而消泯了歲月與乖隔，彷彿回到新婚時光。離鄉數十年的變化、落差乃至漫漫時空，都因為故土的當下現實而得以抹除，旅程的終點與生命的終點都是「家」。

相對於楊敬遠的憂患悲辛，李謹洲返鄉則開啟了一系列的衝突與重整。

〈桃花井〉寫李謹洲回到故鄉桃花井，續娶老邁的從良妓女董婆為妻，安家落戶；〈探親〉是李謹洲的臺灣孫女家愛、家寶為探望爺爺拜訪桃花井的見聞；〈兄弟〉是李謹洲病逝前後，分隔兩地的兩個兒子慎思、慎行的紛爭；〈歸去來兮〉則是李謹洲五週年忌日，臺灣家人集體前往祭祖，因而得知的董婆身後事。這四篇以李謹洲為串連人物，呈現桃花井與臺北兩地的人情世故，尤其彰顯了眾多人物美醜兼具的人性本色。林俊穎指出，《桃花井》中人物的心機算計正是「醒世恆言、喻世明言的今之變體」，亦云「她的小說世界沒有虛構，沒有神話，物物皆實」，回到了「說部、說故事的傳統」¹³⁾，除了人物相連，此篇之配角成為他篇之主角的說部架構外，更關鍵的是蔣曉雲不避善惡、不分士庶，充分鋪陳圓形人物（round character）的人生境遇和行止變化。例如〈桃花井〉中媳婦小紅善於審時度勢、察言觀色，來往遊說將自己的婆婆一嫁再嫁，既讓董婆有所依託，也為自己的小家庭貼補家計。然而這種明敏靈巧，到

13) 林俊穎〈小說修行者〉，《印刻文學生活誌》，6:12=84（新北市：INK印刻文學出版，2010.08），頁76。

了〈探親〉，進一步成為操縱董婆盜取李謹洲存款的心機手段，讓本來感念李謹洲、不願劫奪財產的董婆騎虎難下，不得不成了小紅的共犯。相對地，董婆原來是個心鈍口拙、任憑擺佈的無知老婦，在〈兄弟〉中卻無微不至地照顧形同癱瘓的李謹洲，贏得慎行的認可：「沒人比阿姨還照顧得好了」（《桃》，頁222），到了〈歸去來兮〉，讀者才更知道李謹洲死後董婆以身相殉，實現了她曾經向慎行說過的：「你爺走後，我也活不久了囉」（《桃》，頁220）。

這些人物的性格、行為，都隨同各種遭遇、處境而變化，事實上，不但是人物的成長，也是桃花井一地，或八〇年代以後走向開放之途的中國的變化，是海峽兩岸互動模式的變化。如果由機敏而巧詐、所求所欲日益增加的小紅可以做為當代中國的典型，董婆則是展開了淳樸木訥、不為鄉里所重、最後卻有始有終、有情有義的傳統中國印象。成長於臺灣的年輕少女家愛、家寶，在探親時與桃花井眾人的互動、彼此的評價，則明顯看出當時兩岸文化與習慣的差異，已經不是「人不親土親」等觀念可以化解。李謹洲認為回鄉萬事足，對孫女們說，「這裡是爺爺的家，爺爺不走了」（《桃》，頁156），家愛、家寶卻是「抱頭痛哭」，「都覺得她們留下爺爺在一說不出哪裡不對勁的『險地』」，「爺爺既救不出又帶不走」，在本地親族眼中，兩人「哭得像是把十二爹爹（即李謹洲）留在賊窩裡了」（《桃》，頁157-158）。作者雖非有意隱喻，重心可能更在人物的自然表現，但正因為這種自然表現人物，遂同樣自然地表現了海峽兩岸的星移物換、流轉遷變，以及集體視野中的彼此形象。

更能代表兩岸複雜情結的是慎思、慎行兄弟。一九四九年，李謹洲身為曾經剿共清鄉的國民黨縣長，準備先帶八歲長子慎思離開，慎思卻不願跟，三歲的慎行意外說出「帶我去吧？我乖，我不哭！」，「兩兄弟一生的命運就此決定，再也回不了頭了」（《桃》，頁71）。李謹洲初抵桃花井，輾轉找到失散數十年的長子，本應父慈子孝，沒想到卻是紛爭的開始。兩兄弟原來遠隔海峽，還能同聲共氣，反對李謹洲在家鄉大張旗鼓、慷慨解囊，然而時日既久、當面相逢，卻又各懷怨懟。對慎思而言，經歷國共易幟、反右、文革，原國民黨縣長之子自然飽嘗患難冷暖，弟弟慎行在臺灣受大學教育、工作穩定，如同掠奪了本屬於他的人生。然而慎行在臺灣也因為李謹洲入獄，自幼受人歧視，即使考取公費留美，也因為家境貧寒，無法湊齊路費而被迫放棄。因為對彼此際遇的

想像、對一己遭逢現實的體認，雙方初通音訊時的兄弟同心，都在密切往來中轉為怨懟和不耐。兄弟的不睦，彰顯血脈相連、語言相通的海峽兩岸無法簡單跨越時間的距離，楊敬遠和李謹洲等老者盼望死於故土，生命的盡頭就是畢生心願的完成，然而海峽兩岸的集體命運卻像慎思慎行兄弟，並沒有終止、完結的時刻。慎思慎行究竟誰吃更多苦、更委屈，兩人的互動中究竟誰多忍讓、誰不識相，是無法停止的計算，這種個體的計算其實也是中國與臺灣的計算：做為源頭、兄長的中國自認擁有某種權力，分離在外、自有甘苦的臺灣則試圖開展自己的命運。

有趣的是，小說中慎思屢屢認為慎行有一種「臭老九知識分子優越感」（《桃》，頁196），多次質問慎行「你瞧不起老子？以為老子就不如你？」「上過大學就了不起？是城裡人就可以瞧不起農村來的？」（《桃》，頁195）——這些憤怒與心結，貫申了小說內外的不同時空。小說之內主要記述八〇年代後半、九〇年代初期，〈歸去來兮〉一篇寫的是二〇〇五年的掃墓祭祖，卻以五年前李謹洲死後的董婆事蹟為中心；小說寫作則在二〇一〇~二〇一一年間——二十年裡，現實中的中國與臺灣聲勢逆轉，臺灣由領先的經濟體轉而為大幅度依賴中國的勞工、市場，然而這一層相互想像仍未結束。臺灣人屢次透過新聞媒體看到中國旅客在歐美鋪張揚厲、在香港隨地便溺、在臺灣不排隊、無秩序的行止，認定中國人欠缺文化素養；中國網民則一再認為「高貴冷艷」的臺灣人宣稱不是中國的一部分，是以早已消逝無存的經濟優勢鄙視祖國¹⁴。海峽兩

14) 在今日中國網路語境中，「高貴冷艷」一詞帶有強烈的諷刺意味，常與臺灣連結。例如，中國網路上會有使用者稱臺灣人為「灣灣」或「臺巴子」，抱怨臺灣民宿昂貴，標題是「吐槽！臺灣清境農場的有一些民宿真是高貴冷艷呢！」（<http://www.douban.com/group/topic/53624518/>，2014.09.12檢索）；當有人於網路發文「高貴冷艷的臺灣人」，會出現此類回覆：「DungeonStriker：早說優越感十足了。還有人屁顛屁顛去玩。說臺灣人如何如何有素質，真是長他人志氣滅自己威風」、「qwewer：回復下雨戴套套：對是一定，臺灣人素質都非常非常的高，他們從來都不罵人只做好事。然而做壞事的都是大陸人。你也一定和灣灣人一樣，你肯定不屬於“低素質”的大陸人。恩就是這樣！！」（<http://tieba.baidu.com/p/2711155054>，2014.09.12檢索）；或者直接發起抵制臺灣人的行動，標題即為「高貴冷艷滴臺巴子，回去臺灣論壇吧，別在中國論壇混了！」（<http://bbs.tianya.cn/post-333-445426-1.shtml>，2014.09.12檢索）。另外，中國作家韓寒二〇一二年前往臺灣旅行，將所見所聞寫為〈太平洋的風〉（<http://www.weibo.com/1191258123/yiuJilAr8>，2014.09.12檢索），引起海峽兩岸熱

岸因為生活模式、價值取向、政治主張、意識型態等多種層面的問題時有衝突，關鍵不在於中國人或臺灣人本質如何，而在彼此纏結複雜、既親近又疏遠的關係，和慎思、慎行二人血緣份屬兄弟、相知卻不如鄰里的矛盾尷尬是一致的。李謹洲回到桃花井，娶妻、安居、歸葬，價值的核心是重建家園，恢復他拋離鄉土之前的縣長風光，並解決生命的失落和虧欠，作為離散的第一代，他和楊敬遠都可以在生命的終點真正的「回家」。但是因為前人的離散而走向不同時空環境的慎行，乃至於開枝散葉之後，對所謂「故鄉」並無嚮慕之情的家愛、家寶，與留在故土的慎思一家，就難以藉著父祖輩李謹洲的重建家園而認同那是自己的家鄉。

四、離散素人：中國、臺灣、美國

其實沉寂文壇三十年後復出，蔣曉雲一心要寫的並不是楊敬遠、李謹洲的家園去來，而是「民國素人誌」系列：系列中預計包含三十八位素人，女主角生年必須落在民國元年至三十八年，亦即一九一二年至一九四九年之間。靈感來自她自幼聽父母親長言談訴說的眾多人事，以那一代人所遭遇的時代亂離為中心，其中部份故事化自真實人物事蹟¹⁵⁾，部分則出於她的拼湊想像。這個系列

烈討論，蔚為當年度熱門文化事件，顏浩〈最熟悉的陌生人——想像中的『臺灣』〉一文認為這其實是海峽兩岸的相互想像，「由於太多的理念和想像被投射其中，臺灣的面貌並沒有變得清晰。而韓寒這篇文章的出現及其引發的爭議足以證明，通過言說和想像構建的『臺灣』，已經成為了映照當下生活的一面魔鏡。」收錄於楊早、薩支山編，《話題2012》（北京：三聯書店，2013.01），頁169。

15) 最足以作為代表者當屬〈北國有佳人〉與〈昨宵綺帳〉中的上海舞國名花應雪燕，作為陸永棠的情人到了臺灣，卻與青年飛官畢東川相戀，出奔結婚後畢東川殉職，從此穿著「一身白旗袍，白色緞面鞋子」（《百》，頁182），經營供達官貴人打牌吃飯的會館。此中應雪燕與白先勇〈永遠的尹雪艷〉形象幾無二致，姓名發音也極其近似，除了因為蔣曉雲意圖向曾鼓勵自己寫作的前輩作家白先勇致敬，也因為確有其人。蔣曉雲幾度在訪談中提及此事，例如〈《百年好合》：民國素人傳奇〉中：

有些人有原型，比如應雪燕，原型是當年上海舞國紅星「小北京」尹雪艷，當然身世是「瞎編的」。「她是我朋友家中長輩的『相好』，她那18英寸的纖腰就是有根據的，有讀者說這個

目前已出版《百年好合》與《紅柳娃》兩冊，計十二篇短篇小說。雖然距離計劃中的三十八人尚遠，但已經引起相當注目，二〇一三年十二月已於中國出版兩冊合訂的中國版《百年好合》，頗受好評¹⁶。蔣曉雲在《紅柳娃》序言中感慨臺灣社會與歷史記憶變遷，甚至有民國消亡之嘆：

前年我在上海逛書店，看見有關民國書籍的專櫃豎立在研究明、清書籍的專櫃旁邊；一葉知秋，中華民國在它的發祥地已經「被」走入歷史，歸為前朝。等我站在臺北街頭，擦肩而過的陌生人卻可能正從那個消逝中的民國走來，可是路上行人熙來攘往，茫然不覺，只冷漠地讓他們從身旁過去。「中華民國在臺灣」的國民政府對自身遷臺之前歷史的淡然讓民國百年像臺北街上直至背影消失也無人回望一眼的老人那樣，靜悄悄地流淌過去，轉眼間無影無蹤。

故園之思豈止一水？「重來回首已三生」！臺北明明是自己的出生之地，為什麼回來了卻感覺恍若隔世？背棄文學三十年，再不能已於言，我開始訴說民國素人的故事。……「民國素人誌」的每一卷都是我為民國獻上的一個小小壽桃。這是樸素的人用樸素的方式，卑微地紀念著辛亥以來的百年風霜。（《紅》，頁8）

這樣的序言幾乎可以說是黍離麥秀之悲。在蔣曉雲去國離鄉的三十年間，因為社會局勢改易，臺灣意識已然形成，「臺灣」已經取代「中國」，成為民眾的認同

人物『偷』自白先勇先生的作品，那是所知有限而且冤枉我了。』（《TimeOut消費導刊·閱讀》，2014.03.07，http://beijing.timeoutcn.com/ShowArticle_13071.htm，2014.09.14檢索。）

又如〈蔣曉雲：我和張愛玲沒可比性〉：

事實上我覺得白先勇先生比我膽子大，因為尹雪艷是確有其人的，她是上海當年百樂門舞廳的紅牌，她的花名就叫「小北京」。我知道這位人物的時候她已經八十多歲了，住在舊金山郊區的豪宅區，她九十多歲的男朋友就瞞著他一百歲的太太偷偷去看望她。我覺得特別的浪漫，激發了我對這個人物的一種想像，一種好奇，然後我又知道她就是尹雪艷，我就給她編了一生的故事。因為我三十多年前看過〈永遠的尹雪艷〉，所以下筆的時候就覺得她那時候在台北就應該穿著一身白啊什麼的，又給她配了一個帥哥空軍男朋友，這一部分統統是拼湊的，所以我自己也可以看成這個作品是在向《永遠的尹雪艷》致敬。那麼有人說我是偷了白先勇先生的人物這就不正確了，因為這位老太太差不多十年前還有一百歲的男朋友去看她呢。（《晶報·人文正刊》，李家威編輯，2014.03.27，http://www.jingme.net/content/2014-03/27/content_9275975.htm，2014.09.14檢索）

16) 中國亞馬遜 (amazon.cn) 的二十九筆讀者評價中，二十筆給予五星、七筆給予四星、兩筆給予三星評等，滿分五分中，獲得四點六的平均分數。（2014.09.13檢索）

核心。無論執政者屬於什麼政黨，試圖推行什麼政策，都必須一再強調所有考量舉措皆本於「臺灣人」的利益與價值，「中華民國」的角色因此顯得虛空渾沌。在這樣的陳述中，作者蔣曉雲已經和筆下人物一樣，成為離散主體，「素人誌」不只是對民國素人的紀錄，也是作為素人的自己、對心底「故國」的銘誌：這個系列的小說既是離散經驗的敘述，又是歷史記憶的尋覓。

李有成討論 Mira Nair 的電影《密西西比的馬薩拉》(Mississippi Masala, 1991) 時，對其中角色傑伊的分析可以提供參考：

在身分被否定，又失去了疆界之後，傑伊一家注定要變成雙重離散的移民……因此我們不妨把身分視為一個過程，只不過這個過程顯然無法擺脫情境 (situation) 的限制。質言之，任何身分的討論必然受制於情境 (situated) 或時地 (placed) ——至少你必須從某處開始。……對傑伊而言，烏干達——不管是作為國族國家、文化、歷史、家園或記憶——乃是分辨你我、區別歸屬性 (belongingness) 與他者性 (otherness) 之間差異的根本類別。像許多被流放的人一樣，他心中的身分屬於過去，對他來說，身分顯然是存有 (being) 的。

身分既受制於位置政治，因此也就無法免於歷史文化的介入。同時，當我們強調身分是個過程時，我們也無異承認身分也是形成的 (becoming)。¹⁷⁾

對於具備中華民國國籍、於一九四九年離開中國大陸的人們來說，所經歷的就是這一類雙重離散，既是空間的，也是身分的。例如，蔣曉雲的父執輩自中國大陸往異鄉臺灣移動，在移動當下，中國大陸與臺灣都屬於中華民國領土，雖然有家歸不得，畢竟是在國土之內的不同省份遷徙。然而在臺灣意識與中國意識的頹頹消長之後，「臺灣」和「中國」等語彙的內涵都已經改變了，「臺灣」從中國境內的一個空間或行政區域名稱，轉而為此地居民的國族認同、身分標誌；「中國」由包含中國大陸與臺澎金馬等土地的中華民國，轉而為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簡稱。於是，身在臺灣土地上、自居中華民國國民的「中國人」，便經歷了第二次的離散，除了要適應與故鄉不同的風物節候、生活模式，還要重新思考自己的歸屬和認同。前文所述〈青青庭草〉中的張晴老可以在美國固守舊中國、舊文化，因為「美國」的意涵對他而言並未發生變化，但蔣曉雲及身在臺灣的其他外省族群，就必然受到衝擊：「外省人」不再只是空間的記號，而是一個浮動

17) 李有成，《離散》(臺北市：允晨文化，2013.08)，頁58-59。

的、隨著情境 (situation) 的固著與變化而繼續形成中的歷史身分、文化身分。

我們可以由此觀察《百年好合》與《紅柳娃》中的離散群體，遷徙、移動是他們共同的生命歷程，並且，他們也或多或少有血緣或姻親的關係¹⁸⁾。其中開宗明義、提綱挈領的〈百年好合〉一篇，記述民國元年出生的女主角金蘭熹名為九十五歲、實為百歲的生日宴，由生日宴會帶出金蘭熹的家族背景與時代因緣。金蘭熹與陸永棠相識於上海，在戰亂之世結婚之後離開中國，因經商關係住過香港、阿根廷、巴西等地，又將女兒陸貞霓嫁給更為富裕的美國華僑黃智成。金蘭熹的異母妹妹舜蓉、舜美到了臺灣：舜蓉與安居聖的女兒安靜嫁給身在美國的黃智舒，安心與臺灣本地人郭銀俊結婚，舜美則隨夫婿齊至儀到了美國。除了金家、黃家兩大富戶之外，回族女子翟古麗、其女韓琪曼與孫女韓寶寶的移動，黃智成婚前情人商淑英與其女黃愛芬的移動，安居聖前妻辛貞燕之子安亦嗣、女友關榕嘉的移動……凡此種種，都是跨世代，由中國向臺灣或香港等中介地，既而抵達美國的華人離散途徑，不但是一部家族史，也是國族史。

因此，這些個體自願或被迫的移動，第一階段由中國大陸前往香港或臺灣，幾乎都與國內戰有關。金蘭熹、陸永棠這一類商家出身者，了解金融局勢的可能變化，預先移動，因而保住家產，未因離散遭到貧病折磨；金舜蓉、金舜美則是隨著國民黨敗退來臺，但因為家境殷實、有長姊或身居要職的姻親可以依靠，反映的是中產階級的遷徙。但安居聖的前妻辛貞燕，在家鄉侍奉安居聖父母，就曾經歷過共產黨入城後的身心疲困才輾轉逃離；商淑英前往臺灣的過程，則充滿愛情的遺棄、背叛、無可奈何。因為遷移的契機或情境不同，他們在香港或臺灣的遭遇也不同。中產階級以上的家庭，多半繼續維持既有的社經優勢：陸貞霓、安靜嫁至美國，安心雖與臺灣本地人結婚，夫婿郭銀俊也是臺灣經濟起飛時代的中小企業主。相對地，商淑英在臺灣又經歷過張汶棋（抵臺後改名張世棋）、老賈等兩段男女關係，經歷了危疑驚險的逃躲，才因為嫁到美國、在餐廳洗碗而離開臺灣；商淑英之女張愛芬與母親分離，寄居翟

18) 王安憶〈民國素人歸去來〉在點評小說之間，串連說明了眾多人物的關係，可以參看。
<http://cxnews.zjol.com.cn/cxnews/system/2014/03/17/017790830.shtml> (2014.09.13 檢索)

古麗家中，憑藉婚姻才能前往美國與母親團聚。像翟古麗這樣的升斗小民，女兒韓琪曼飽經愛情騙局，要等到第三代的韓寶寶才戲劇性地得到赴美讀書的機會。辛貞燕之子安亦嗣，雖然曾有跑船機會，終究還是因為愛情糾葛留在臺灣，前女友關榕嘉則回到美國，各奔東西。這一類的遷徙，自然難免貧病與無奈。然而不管是哪一類，「婚姻」都是開啟第二階段的移動、奔赴下一地點的方式，與這個系列開端的金蘭熹其實並無二致。

於是，讀者可能認為，「民國素人誌」中由中國、香港、臺灣等地，透過婚姻前往美國的離散之途，是否以男女關係代表了國族關係？然而，和上文討論過的諸多留學生相同，這些婚姻關係仍然都限制在華人圈內，未曾跨越種族的界線。少數跨越種族的是回人翟古麗一系，翟古麗與漢人學生兵韓國清私奔、韓國清改信回教、隨妻子奉行伊斯蘭儀節，其女韓琪曼在臺灣與土耳其人白鵬相戀結婚而有韓寶寶，白鵬下落不明之後又受其友伊利亞利用，但這樣跨越種族的關係帶給她的不是遷移，反而人財兩空，滯留臺灣、無法移動。韓寶寶可以赴美讀書，是韓琪曼與許志賢的外遇關係曝光、危及許志賢仕途，韓寶寶代替母親出面剃光頭向許志賢原配陪罪道歉，才得到的交換條件。因此，婚姻並未將老中青三代離散華人帶往異文化，卻是限制人們停留在固有的文化圈、血緣圈中。這又回到本文第二節所述，蔣曉雲筆下的離散華人是一個封閉群體，與第二節的留學生不同之處僅在於，這一類離散者去國離鄉的動機較強烈。這些民國素人的第一階段離散是迫於局勢，無可奈何，但第二階段往往是對居處的當下環境仍然懷有不安，或者不滿，於是主動積極，例如安靜等一批官宦小姐以宗教考察朝聖的名義赴歐轉美，商淑英即使暫時放下女兒也要離開臺灣。

由此思考蔣曉雲眼中所見父執輩，在她看來，雖同為外省人，在臺灣的處境卻與眷村中的外省人不同。離鄉去國、漂泊海島的大批戰爭難民中，眷村因為有個穩定、聚集的空間，有一群職業相同的鄰里，使眷村牆內居民相對而言較牆外人稍有安居落戶之感，因為這個特殊空間提供的族群同質性、生活封閉性，讓離散之途到此為止，縱使牆外就是臺灣本地的閩客族群，眷村的牆壁院落與崗哨等設置，也將離散者與當地居民區隔開來。眷村牆外的外省族群沒有這一層區隔與保護，例如陸貞霓與香港花匠之子亞發青梅竹馬的關係，安心與

郭銀俊的戀愛——其實這一類離散族群是更有機會與本地人互動、融入在地生活的。只是，如果他們繼續第二階段的離散，前往美國，則又和眷村中人一樣，以語言或血緣等無形的高牆，將自己與當地區隔開來。於是，從讀者角度來說，即使沒有眷村的圍牆，蔣曉雲筆下的離散族群，仍然自有固守不破的疆域，到了美國也以華人文緣為底線。

在此我們需要進一步觀察那些未前往美國、與臺灣當地本省人共組家庭的外省角色。除了辛貞燕之子安亦嗣的配偶在小說中未曾真正登場，省籍、背景不明之外，〈人生若只如初見〉中嫁入臺籍家庭的安心即為一例。安心於美國新聞處工作時，年輕貌美，頗有追求者，但安太太金舜蓉仍固守血統界線：「雖然想女兒去美國，卻矛盾地不希望女兒嫁洋人」（《紅》，頁75），於是安心終究還是嫁給學生時代的本省籍戀人郭銀俊，婚後才發現郭銀俊早在婚前已有私生女，婚後也外遇不斷，夫妻二人形同陌路。安心幾經打擊，開始以丈夫的金錢加入臺北的房產投資熱潮，為自己的兩個兒子不斷購置豪宅，鞏固產權。當丈夫在情人處中風病逝，安心更進一步主持喪禮，除了郭銀俊婚前私生女郭小美的名字可以添入訃聞中，其他各方情婦、私生子女都嚴加防範，因為「她的整個婚姻生活都在和外面那些看得見和看不見的第三者纏鬥，現在上風終於吹到了她這邊，她必須打起十二萬分精神來確認自己的最後勝利，安心只能暫時把悲傷放下」。於是安心繼續延伸戰場，「喪禮整天安心的神經都為提防可能『來犯』的情敵繃得很緊，連哀悼的情緒都沒有。」（《紅》，頁98）等到喪禮結束，回到只剩自己的大別墅：

她前後走來走去，完全沒有發現會觸動她未亡人心情的角落。她想自己早就在過去的三十年裡分期預付了今日的冷清和傷心，現在反而算是難過到了頭，感覺也就是比平日忙的一天罷了。

……

不管怎樣，自認守了多年活寡的安二小姐，在六十八足歲時成了名符其實的寡婦，她雖然感覺若有所失，心裡卻又很踏實：餘生她會繼續信守畢生唯一愛的承諾，卻不會再為背叛而心碎流淚了。（《紅》，頁100）

為了愛情奮鬥十年、終於得到父母允可的婚姻，開啟的卻是三十年的寂寞悲哀。安心反覆裝潢龐大的別墅，鞏固的其實是一座燦爛輝煌的冷宮，喪禮的各種防備措施，成為她對家庭的捍衛儀式，即使這個家庭的內容可能是空蕩虛無的。

另一個例子是成為臺籍政治菁英許志賢外室的韓琪曼，在許志賢選舉前被對手揭發，韓寶寶代母落髮：

美麗的寶寶在紮得像戲台一樣的競選場子裡當眾落髮，她垂著淚，替她的母親向原配陪罪；臺北下來的鍵盤手被寶寶和地緣所在激發靈感，彈奏起主旨八竿子打不著，可是歌詞中提到混血美女在台南海邊癡等情郎的〈安平追想曲〉。台下婆婆媽媽哭成一堆，幕僚幾乎是快樂地在一旁偷偷評估可能回流的婦女票。被迫站上台接受謝罪的志賢太太卻在醜聞發生後首次當眾痛哭，平素冷靜到不動聲色的「正宮」在這個荒誕的時空裡哭得真實而淒慘：多麼殘忍啊，他們不准她不承認丈夫對她和家庭的不忠，還要她上台公開表演大度。（《紅》，頁38）

這一幕幾乎是臺灣地方選舉的實況轉播，政治人物的婚外關係總是成為選舉議題，而合法配偶總是必須在桃色緋聞中登場表達對丈夫不變的支持和信賴，韓寶寶也完全融入這一幕，真正參與了在地社會。與此同時，人在家中、對此事漠不關心的韓琪曼卻正看著流行的八點檔連續劇，並不惋惜女兒的頭髮，反而認為女兒因此得以出國留學：

「不管怎樣，日子反正都要過下去！」琪曼想起媽媽古麗常說的話。她從來不是個聽媽媽話的女兒，這句卻記住了。（《紅》，頁39）

翟古麗「不管怎樣，日子反正都要過下去！」的箴言，不只是自我鼓勵，更是離散族群在遠離故土之後，適應當地生活的必備信念。比較之下，翟古麗一家不能妥協的是伊斯蘭戒律儀節，只要奉守毋失，就足以鞏固自己的根源，在其他層面反而慢慢融入了在地生活。然而，其實她們也都有一個必須固守的無形疆域，將她們區別於在地文化、生活之外，例如清真牛肉等飲食規範，使她們容易與信仰相同者聚集，無論身在中國大陸、臺灣或全世界任何國家，信仰界線始終凌駕國籍界線之上。

蔣曉雲指出，韓琪曼、安心、安靜、關裕嘉都是「沖齡離家，在臺灣長大成人的『新臺灣人』」（《紅》，頁7），認為影響這幾個女性生活際遇的因素，已經從內憂外患，轉移到臺灣社會變遷。然而細查安靜與關裕嘉的跨國遷移，還是嫁給在美華人；韓琪曼與安心的婚戀對象雖不見得是與自己相似的離散者，但在融入當地生活的過程裡，她們仍然主動或被動地構築了一道界線，作為自己的人生堡壘。因此，在蔣曉雲筆下的外省族裔，不論離散何處，都保有以根源作為人生框架的特徵，她們或許在新的居住之地球學、工作、戀愛、婚

姻，但都有必須遵守的無形條件，如翟古麗一家的伊斯蘭信仰，或華人血緣為限的婚姻對象等。¹⁹⁾若我們回到這個系列之首的金蘭熹，民國元年出生，與陸永棠結婚當天正逢西安事變，既而中日戰爭正式開始，抗戰之後又是國共內戰，他們「迅速結束了公主王子婚後的日子，加入『二十世紀猶太人』中國難民的大軍走向世界」，半世紀後回到上海，「竟然不覺得改變太大不習慣」：

十年前他們在原來住的街上買了外銷樓，道旁梧桐青青鬱鬱，不是從前還勝似從前。……全樓住的不是他們這樣衣錦還鄉的老華僑就是洋人高層租客，前台沿習百年租界作風用外語跟住戶打招呼。街市上倒是鄉音依舊，只多出幾個他們耳朵聽起來粗糙的「外來」形容詞。……雖然高樓單位沒有當年的獨立庭院，坐在客廳裡卻可以看到近處的幾個外國領事館內花團錦簇，草木扶疏，一恍神會以為裡面還住著從前那些人。（《百》，頁24）

五十年之間不可能沒有現實的變遷，然而對兩個近百老人而言，故土仍是故土，曾經移植海外的生命仍舊可以適應久違的風土。於是金蘭熹的百歲壽宴其實充滿了象徵意義：這是這一批離散者，在海外執守根源，無論政治、經濟、國際關係如何演變，都可以消解歸零，回到故土即可成就「百年好合」之喜。

五、結論：國與家

離散論述具有多元、複雜的內涵，在歷次重大戰爭之後，全世界又走入跨

19) 這個系列中比較特殊的是〈蝶戀花〉中的郭寶珠母女。郭寶珠是臺籍農村養女，在名義上的親戚郭銀俊家中半工半讀，郭銀俊與之初見面時即發生性關係，此後一邊和外省千金安心戀愛，一邊與家中少女寶珠溫存，「理直氣壯地實踐著『靈肉分離』的三角關係」（《紅》，頁175），因而有了女兒郭小美。郭銀俊與安心婚後，郭寶珠繼續擔任郭氏企業的會計一職，又經相親嫁與本省籍蔡有呷，郭銀俊父母視為女兒出嫁，陪送豐厚妝奩，郭蔡兩家持續保持友好關係。郭寶珠與蔡有呷婚後感情甚篤，蔡有呷亦十分疼愛郭小美，「沒有血緣的有呷以無私的父愛站穩了小美心裡那個至親的位子，是銀俊用名利買不走的」（《紅》，頁194），即使郭銀俊試圖栽培郭小美出國讀書，都遭郭小美拒絕。郭寶珠與郭小美這一線故事，雖同在「民國素人誌」系列中，但主要人物皆為臺灣本省籍，仍為目前為止的唯一一例。此中人物沒有出國離家，郭寶珠雖由農村移動至城市，但與養母家庭仍密切往來，價值觀和生活模式都沒有重大變化，因此暫不在本文討論之列，留待「民國素人誌」後續其他角色登場，才能就其互動關係或交錯影響加以辨析。

國經濟的時代，各地皆有離散族群，各離散族群皆有不同的形成脈絡與生命內涵。即以中華民國在國共內戰敗退後出現的離散者而言，蔣曉雲所記就不是唯一的形態，甚至也可能不是最大宗的一群。因此，要簡單地以「離散」二字囊括一切相應而生的文學創作或文化活動，都是粗疏簡略的。本文以蔣曉雲為例，盡可能耙梳文本、分析細節，尋找的不是民國離散的整體面貌，而是希望從中理解在那個離散時代的離散民國，可能存在有何種形態的離散。

前面數節的討論涉及蔣曉雲前後相隔三十年的兩個創作階段、橫跨多國的三大關懷主題，可以說是她半生沉澱，終於織就的見聞與紀念。在這些留學生、異鄉客、離散素人之間，當然各有生命的甘苦起落，也各自歡愉轉瞬、艱辛備嘗。除了個別境遇之外，更可以看出他們自有共同之處：都在離散的命運中自願或非自願地依循故土或傳統的規範，遵守族群的邊界。這一類離鄉去國者，在時空轉折流盪之間，必須面對的是「國」與「家」的變異。

我們可以參考李有成對離散的家國想像之論：

離散之所以為離散是因為存在著兩個「中心」。一個是離散的始源，也就是這一章標題（按：「家國想像」）中提到的家國，包括了家園、部族、國家或國族國家等（參考Clifford 1997:250）。另一個則是居留地，也就是離散社群賴以依附並形成網絡的地方。離散介於這兩個「中心」，擺盪在柯立佛的「根」（roots）與「路」（routes）之間——「根」屬於家國，屬於過去與記憶，屬於有朝一日可望回歸的地方；「路」則屬於居留地，屬於未來，導向未知。在「根」與「路」之間，離散不時與上述兩個「中心」對話。²⁰

由此，蔣曉雲筆下的離散者，如何在根與路、家國與居留地兩個中心之間與之對話？我們可以發現，離鄉去國是他們遭遇的現實，他們的鄉土與國土是空間的起點，也是文化的羈絆。這一層羈絆如何綰繫成結？當這些離散者竭盡所能在異鄉維繫華人之間的婚姻關係，我們可以進一步理解，「國」是基於政治想像的共同體，「家」是繫於血緣脈絡的共同體，這一批離散者是在失國或去國之後，以「家」的保存作為補償。於是，不論身在何地、家在何處，不論他們為美國財團或臺灣企業工作，一家之中的組成成員、生活習慣都不會有太大的波動，家的意義與內涵也不會更改。

前文曾經指出，對身在臺灣的外省人而言，二十世紀七〇年代的國際局勢

20) 同註17，頁40-41。

不變、八〇年代的臺灣社會轉型，讓他們經歷了雙重離散，「中國」與「臺灣」在空間和國族架構上的符指更迭代易之後，「國之不存」不但是物理空間的遠隔，還是心理歸屬的錯亂。柯慶明〈臺灣「現代主義」小說序論〉指出：

這種自我存在意義感之失落的「失心」狀態，主要來自生命的「斷裂」與陷入了「孤絕」的生存型態。但它不必然只發生在內戰或戰爭所造成的流離處境。「現代性」的特質之一，更是世界性一致的科技知識，全球性的經貿網絡，以及經濟先進的富裕國家與國際性大都會對於廣大周邊的磁吸作用，因而造成了或因求學，或因覓職而形成的廣泛的「離散」(Diaspora)現象。但「離散」的開始，既是生命的轉機，也是生命的危機。若未能在新居地重建起生命的網絡與自我的精神認同，「離散」正是自陷生命於「斷裂」與「孤絕」的狀態，尤其在人潮不斷的國際大都會人們更容易以「物化」的態度，只以「表象」對待彼此，因而就很容易形成了群眾中的孤寂。假如再斷絕了與故鄉的情感連繫，遂如斷線的風箏，只有隨風飄墜的命運。²¹⁾

於是，我們可以理解蔣曉雲筆下人物克服這個失心狀態的方式。因為現代經貿發展而出國留學、就職者，因為戰爭亂離而拋別鄉土者，都必須「在新居地重建起生命的網絡與自我的精神認同」，並且絕不能「斷絕了與故鄉的情感連繫」：他們放下國族糾葛，力守家族綿延，在異鄉異國建立起嶄新卻又一切如舊、亂離而仍百年好合之家。

21) 柯慶明，《臺灣現代文學的視野》（臺北市：麥田，2006.12初版），頁170。

參考文獻

【作品集】

- 蔣曉雲 (2011a), 《桃花井》, 新北市: INK印刻文學
蔣曉雲 (2011b), 《掉傘天》, 新北市: INK印刻文學
蔣曉雲 (2011c), 《百年好合》, 新北市: INK印刻文學
蔣曉雲 (2013), 《紅柳娃》, 新北市: INK印刻文學

【中文論著】

- 陳素香 (2012), 〈八〇九〇兩千以及之前和之後〉, 《思想22: 走過八十年代》, 臺北市: 聯經
韓寒 (2012), 〈太平洋的風〉, <http://www.weibo.com/1191258123/yiuJilAr8>, 2014.09.12檢索
蕭阿勤 (2008), 《回歸現實: 臺灣1970年代的戰後世代與文化政治變遷》, 臺北市: 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
蕭阿勤 (2012a), 《重構臺灣: 當代民族主義的文化政治》, 臺北市: 聯經
蕭阿勤 (2012b), 〈世代, 理想, 衝撞——1980年代: 林世煜先生訪談錄〉, 《思想22: 走過八十年代》, 臺北市: 聯經
黃崇憲 (2012), 〈夢想共和國的反挫: 1980年代的個人備忘錄〉, 《思想22: 走過八十年代》, 臺北市: 聯經
柯慶明 (2006), 《臺灣現代文學的視野》, 臺北市: 麥田出版
郭紀舟 (2007), 〈七十年代的《夏潮》雜誌〉, 《思想4: 臺灣的七十年代》, 臺北市: 聯經
李家威編輯 (2014), 〈蔣曉雲: 我和張愛玲沒可比性〉, 《晶報·人文正刊》
http://www.jingme.net/content/2014-03/27/content_9275975.htm, 2014.09.14檢索
李有成 (2013), 《離散》, 臺北市: 允晨文化
李元貞 (2012), 〈播種與茁壯: 回顧1980年代臺灣婦運〉, 《思想22: 走過八

- 十年代》，臺北市：聯經
- 林俊穎 (2010)，〈小說修行者〉，《印刻文學生活誌》，6:12=84，新北市：印刻文學
- 梅家玲 (2004)，〈八、九〇年代眷村小說(家)的家國想像與書寫政治〉，《性別，還是家國？：五〇與八、九〇年代臺灣小說論》，臺北市：麥田
- 湯舒雯紀錄整理 (2010)，〈以幽默的角度寫悲傷的事——朱天文對談蔣曉雲〉，《印刻文學生活誌》6:12=84，新北市：INK印刻文學
- TimeOut消費導刊 (2014)，〈《百年好合》：民國素人傳奇〉，http://beijing.timeoutcn.com/ShowArticle_13071.htm，2014.09.14檢索
- 王安憶 (2014)，〈民國素人歸去來〉，<http://cxnews.zjol.com.cn/cxnews/system/2014/03/17/017790830.shtml>，2014.09.13檢索
- 王智章 (2012)，〈綠色小組的社會實踐：為懷念吳耀忠而作〉，《思想22：走過八十年代》，臺北市：聯經
- 吳介民 (2012)，〈革命在他方？此刻記憶1980年代〉，《思想22：走過八十年代》，臺北市：聯經
- 顏浩 (2013)，〈最熟悉的陌生人——想像中的『臺灣』〉，收錄於楊早、薩支山編，《話題2012》，北京：三聯書店
- 詹曜齊 (2007)，〈七十年代的「現代」來路：幾張素描〉，《思想4：臺灣的七十年代》，臺北市：聯經
- 張茂桂主編 (2010)，《國家與認同：一些外省人的觀點》，臺北市：群學
- 鄭鴻生 (2007)，〈臺灣的文藝復興時代：七十年代初期的思想狀況〉，《思想4：臺灣的七十年代》，臺北市：聯經
- 朱芳玲 (2013)，《流動的鄉愁——從留學生文學到移民文學》，台南市：國立臺灣文學館

【西文論著】

John Makeham and A-Chin Hsiao ed.(2005), *Cultural, Ethnic, and Political*

Nationalism in Contemporary Taiwan,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Virinder S.Kalra, Raminder Kaur, John Hutnyk(2005), *Diaspora and Hybridity*,
《離散與混雜》(2008), 陳以新譯, 新北市：韋伯文化

Abstract

The Days of Diaspora: on the Novels of Chiang Hsiao-Yun after 1980's

He, Ya-Wen

After the Chinese Civil War, the Republic of China on Taiwan and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in the other side of Taiwan Strait had become rivalries. Among people of R.O.C. who leaved Mainland China toward Taiwan with the government are called 'Waishenren (外省人)', and people who leaved before the defeat of government toward Hong Kong or the US are become Ethnic Chinese. Because of the transfer of these people at 1949, the diaspora of half-century has begun.

Although Chiang Hsiao-Yun (蔣曉雲) was born in Taipei, her parents were the outcome of such dispersed group. In this research, I have gone in depth analyzing Chiang Hsiao-Yun's novels after she had settled in the US about 1980's, discussing the abroad students of Taiwan in the US, outlanders and dispersed common. Some of these characters of her novels are based on existing individuals that comes from her parent's generation and others came from people she had encountered. By adding her composing, imaginations and fabricating, these novels reflected immense collectives that experienced the days of diaspora. These three types of characters each have faced their own destinies, physical and mental problems and they all struggle to overcome these issues through relating and returning to the significance and connotation of 'home'. Instead of the nation which is still changing in political imagining, a stable family of clear, definite consanguinity becomes the core of their life in diaspora.

Key words : Chiang Hsiao-Yun (蔣曉雲), Diaspora, Waishengren (外省人), Ethnic Chinese, Chinese Civil War

투 고 일 : 2014. 9. 10. / 심 사 일 : 2014. 9. 15.~ 2014. 10. 15. / 게재확정일 : 2014. 10. 28.